

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

〔日〕西江清高

主编

扶桑与若木

三星堆文明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13

巴蜀书社

〔日〕西江清高 主编

扶桑与若木

——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

K872.7B
2A5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日)
西江清高等著;徐天进等译. —成都:巴蜀书社,
2001.12

(三星堆文明丛书)

ISBN 7-80659-325-X

I.扶... II.①西...②徐... III.①巴蜀文化-研究
-日本 IV.K872.7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657 号

策 划: 段志洪 封面设计: 文小牛
组 稿: 段志洪 何 锐 责任校对: 潘 锦
责任编辑: 罗 红 印制监督: 郭明藻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即为盗版;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028)86636481 86241146

扶桑与若木

(日)西江清高 主编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总编室电话(028)86656816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
发行科电话(028)86658275 86662019
郫县科技书刊印刷厂印刷
郫县东街三段(028)87864170 邮编 61173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0 千
2002 年 4 月第一版 2002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59-325-X/K·25

定价: 2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三星堆文明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学研究丛刊之十五

三星堆文明丛书



封面设计制作
on Aiacarla 文小牛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部分	三星堆文化与文明	(1)
第一篇	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西江清高)	(3)
第二篇	三星堆文化的谱系 (冈村秀典)	(36)
第二部分	三星堆文化的技术与艺术	(53)
第三篇	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 (三船温尚)	(55)
第四篇	试论三星堆一、二号坑出土的璋 (林巳奈夫)	(90)
第五篇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与饕餮纹 (饭岛武次)	(108)
第六篇	三星堆出土青铜兽面纹的来源 (难波纯子)	(126)

第三部分 三星堆文明与古史传说	(157)
第七篇 三星堆古城是杜宇之城 (古贺登)	(159)
第八篇 中国古代的日晕与神话图像 (林巳乃夫)	
.....	(180)
第九篇 中国古代“神树传说”的源流 (徐朝龙)	
.....	(203)
附录	(229)
一、四川古代文化关系文献目录 (高阶审太郎编)	
.....	(231)
二、编著及作者介绍.....	(239)
后记	(242)

第一部分

三星堆文化与文明



第一篇 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

(日) 西江清高

一、成都平原及其周围的地理环境

1. 四川盆地的地理环境和古代的农业

在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我们虽然应该尽量避免环境决定论的影响。但是，人类社会自成立以来和自然环境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不论是历史学研究，还是考古学研究，环境问题往往成为各种讨论的大前提。当我们着眼于地理的或生态的侧面时，对四川古代史的认识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新的启示。本文旨在以地理环境问题为切入点，试就四川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略陈鄙见，以求教于方家。

四川盆地大体是指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县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的、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其西部由盆地外围的山地和川西高原区构成了广大的山地地带。发源于其东端的岷江、沱江等河流在山麓的东侧形成了成都平原之后顺流而下，汇入长江的主流。由四川盆地的水系构成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由四川盆地流向外部的河流只能通过长江三峡一条通道。这个盆地在地理上的封闭性由此亦可见一斑。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自先史时代以来就形成了比中国内地其他地区自律性更高的地域文化。四川盆地的文化和社会虽然有着很高的自律性，但不容忽视的是，每当它发生重大变化之时，往往会通过有限的交通途径和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西南地区发生相互关系，并产生巨大的历史作用。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的西部，是四川境内最大的，或者可以说是惟一的一处大平原。它是由发源于西北侧的邛崃山、龙门山的岷江、沱江的支流冲积而成的扇状平地。龙泉山似一道屏障横亘于平原的东南侧。成都平原构成了四川盆地中又一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以这个平原为背景，自新石器时代以后，逐渐形成了大规模的社会集团，先后产生了三星堆、十二桥等不同于中原王朝的、带有较强自律性的地域文化。

龙泉山以东的川中地区属丘陵地形，这里完全没有像成都平原那样的平地空间。在包括重庆的川东一带，由东北向西南，因褶曲而形成了几条绵延长远的山地相连的平行岭谷。其间可见较多的山间谷地，形成许多小的地理单元。在川中、川东这样的地形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的地域集团，类似于在云贵

高原形成的、典型的多民族共生的地域。而不可能产生像四川盆地中、东部那样的大规模的社会统一体。

四川盆地的农业生产，至少在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以稻作为主。从现在的水田分布情况来看，连续、平整的水田几乎只见于成都平原。而川中的丘陵地带和川东的平行岭谷地带则多为小型的水田。在这个区域不仅没有形成大的蓄水区，而且土壤的保水率亦不充分。因此，直到今天，河流的灌溉系统仍不发达，依赖于所谓冬水田蓄水的稻作还普遍存在。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古代的川中和川东地区，水稻以外的多种旱地作物可能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1]。相对于成都平原较早的时候就有发达的河流灌溉、形成了以单作为特征的“平原型”农业地带而言，川中、川东地区则成为一个以传统的、小规模的家庭单位经营的、多种植物栽培的“丘陵和山间型”农业地带^[2]。因此，成都平原基于河流灌溉的农业社会模式并不能适用于古代的川中、川东地区的生业形态。

秦、汉以后的成都平原，由于河水治理和灌溉技术的发展，渐渐成为一个拥有大量人口的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与此同时，川东、川中地区则形成了小地域分割的小规模农业经营扩展的区域。藤田胜久先生对此问题有所讨论。他注意到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的墓中常见的随葬陶明器——陶田水池在成都平原以外的诸县均有大量出土，从而认为以家族为单位的生活圈中包括水田和水地这样的小规模农业经营已扩展到成都平原以外的诸地区。藤田氏还强调，四川的历史不能仅仅考虑河流灌溉进步的成都平原，有必要将其作为各种农业形态并存的、诸

地域相关联的复合型社会的历史来认识^[3]。这种可以说是反映四川盆地政治、经济的特质的复合型社会的结构，也是从古至今四川历史的地域特征之所在。

据文献记载，先秦时代的四川盆地存在着巴和蜀两大集团。蜀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巴则指居于川东一带的族群。关于成都平原的蜀，在今成都市附近已发现有多处重要的遗址。而对于巴的中心地区究竟在何处，则至今还不清楚。虽然过去多把涪陵的战国墓群认作是巴王族的墓地，但是当进而问及巴王族所辖地域的基础究竟在何处时，我们仍无法回答。也许统治川东广大区域的、单一的“巴族”并不存在。因为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看，多为丘陵和山地分隔的川中、川东地区不太可能形成像成都平原那样大规模的社会集团。若将“巴”作为居住在四川盆地中、东部的人群的总称的话，则可能和“越”、“百越”的称呼类似，即均为一个族的集团的指称，而不是一个地域集团的称谓，其内部由多个地域集团割据。战国时代前后，在四川盆地东部普遍可见相同样式的巴蜀青铜器，乍看之下，四川盆地东部似乎已形成了统一的文化领域，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遗存都认为是“巴族”的遗存。上述现象只不过反映了在四川东部的诸地域集团共同拥有巴蜀青铜器这一文化因素而已。出土巴蜀青铜器的诸遗址所在地理位置的多样性及埋葬制度的差异，也同样可以说明古代的川中、川东地区为各个不同的文化集团所割据的状况。

2. 成都平原的水利

成都平原长 170 公里、宽 60 ~ 70 公里，平面呈扇形。靠

近山麓的西北侧高、东南低。由位于扇状地形顶部的都江堰往东南约 35 公里，到郫县（位于扇状地形的中部）的高差在 100 米左右。虽说是平原地带，但和华北、华中的粮仓地带相比，这样的扇状地形，于土地利用而言，一方面有丰富的潜在的水资源，同时存在着河流的不安定等问题。但是，一旦河流灌溉系统发达之后，就有很好的条件使之成为肥沃的农业地带。在今天的成都平原，除了扇状地带边缘的一部分排水不良的地点以外，合理地利用丰富的水资源进行河流灌溉，形成了大面积的水田。因为成都平原自身的地形特征，这里自古以来也是和洪水的危害相伴随的灾害地带。在平原的中心地带，冲积层的厚度达 200~300 米的事实，说明了这里自然环境残酷的一面。所以，在这个地区，自古以来为了维持安定的农业社会，更需要寻求水灾的防备和水资源利用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人和水的抗争是推动这个地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一项水利事业的成功，不仅对地域社会的安定和人口的膨胀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和以此为基础的权力结构的形成亦有着密切的关系。

记载先秦时代四川历史的重要文献有《蜀王本纪》、《华阳国志》和《史记》等。《史记》从汉帝国中央的角度记述了“正统”的“中原王朝”以外的巴蜀和西南夷的历史。《华阳国志》、《蜀王本纪》则是由秦汉以后定居于四川的汉人在大量采用了民间的传说资料后完成的著述。其中有《史记》中不曾提到的关于蜀之先王们的记载。此外还有关于治水的记录。四川的治水记录叙述了三个时代的三位文化英雄。即禹王的诞生和治水、鳖灵的治水成功和王位禅让及战国时代秦的蜀郡守李冰

主持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和成都平原相关的最重要的古史传说几乎都是围绕着这三个时代的治水故事展开的，由此亦可窥知成都平原的社会长年所面临的水利问题。

1974年，在都江堰鱼嘴西的外江发现了东汉时期的李冰像。由此可知，在东汉时代的成都平原，战国末的秦人李冰已被作为治水之神而成为人们尊崇的对象。此后还发现了一尊石像，其上有“三石神人”的铭刻。由此推测，原来曾有三尊石像，尚有一尊未发现。有人认为“三石神人”分别是李冰、禹王和开明^[4]。笔者也有类似的推测。对应于蜀地流传的三个时代的三种治水传说，东汉时期立了“三石神人”。

有的学者认为成都平原的治水始自李冰，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在鳖灵的时代都江堰的水利事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由后面将要谈到的考古发现来看，似可证明成都平原的治水可以上溯至比李冰时代更早的时期。鳖灵和李冰一样，也不是蜀人，据传原是荆地的楚人^[5]。鳖灵以前还有禹王治水的传说，并传禹王生于汶山（岷山）。若此，在成都平原流传的三个治水的传说均讲的是“外来人”治水成功的事例，这一点耐人寻味。似乎暗示着以封闭的地理空间为舞台而上演的四川历史，每当发生划时代的重要时期，总不断有“外来者”登场的史实。

在考虑由治水的传说所传达的复杂的历史背景的同时，鹤间和幸推测，在禹王和开明的传说中“源于岷江的湔水（沱江）只是沿扇状地的北端自然灌溉”，而李冰的传说“是用离堆来调节岷江的水流，使其流至扇状地的中央”^[6]。

由考古学的发现得知，成都平原最早的、最确切的治水证据是最近在都江堰发现的东汉时期的李冰的石像。但是，如果把1958年在成都市方池街发现的规整的卵石埂作为水利设施的一部分来考虑的话，其建造的年代可上溯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该设施由东、西、中三条卵石埂呈“之”字形排列，西埂长39米，中埂长26米。中埂和东埂又各由三条和五条小埂组成。虽然其确切的用途还未明了，但有可能是和小型水渠相关的设施的一部分。据王毅的观察，方池街的卵石埂是用竹笼构筑的^[7]。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四川的水利工程中使用竹笼构筑卵石埂的技术传统可以追溯到李冰以前更早的时代。在成都平原，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围墙聚落出现以来，常常可见在城墙内外的构筑和城内建筑物中使用卵石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比较少见。卵石的使用，作为防洪和防潮的一项土木工程技术，成都平原是较早开始发达的地区。

引人注目的还有在方池街水利设施的中埂和东埂交界处发现的陶塑“龙”形物。我们只能凭想象去推测其实际的含义，很可能是具有镇压水患意义的象征物。同样的遗物尚未见于其他地区。这说明成都平原从较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通过对龙的祭祀可以躲避水患的意识。这也反映了在蜀地从人和水之间长期的斗争历史中产生的土著信仰。

3. 连接四川盆地和外界的三条交通道路

四川盆地在中国内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但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有如前面所述的古代治水传说总是和“外来人”有关那样，四川的古代社会实际上也是在和外部发生应

有的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而产生变化的。对于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四川盆地，和外部保持联络的有限的几条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交通道路的掌握和控制也直接关系到政治权力的问题。

四川盆地和外部的交通主要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沿长江和湖南、湖北方面的交流之路；第二条是连接云南的西南之路；第三条是越秦岭和关中平原相交通的道路。由与这三条道路相关的史实，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四川的古代史。古代的四川，通过这些道路吸收外部的文化，并和外部结成政治关系。对这些道路的控制，不论是对四川的地域社会，还是对外部社会向四川地区行使政治影响力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商末到西周时期十二桥文化和关中地区的周之间的政治、文化方面的联系，可以说明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的交通途径。此后兴起于关中地区的秦也沿着相同的路途南下，控制了四川。从此开始，四川地区才成为中华帝国政治版图的组成部分。沿长江和东方的交流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如后所述，在三星堆文化形成前后，三星堆文化曾经引入良渚文化中象征权力的玉器，也导入了二里头文化的各种文物。通过玉璋和青铜器的导入，和二里头文化保持着一种缓和的政治关系。此后，仍然通过相同的路途，传入了长江中游地区商式青铜器的技术和样式，生产了三星堆的器物坑和汉中地区出土的青铜尊、罍等青铜器。三星堆的青铜假面和神树等大型青铜器也是利用了商系统的青铜铸造技术制作的。另外，三星堆文化陶器的要素也波及到四川东部的长江沿岸及湖北的西陵峡一带。